

论“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偏颇 ——以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为视角

赵继龙

西南大学 重庆北碚 400715

摘要：从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视角出发，“欧洲中心主义”存在严重的理论偏颇，表现为“对民族发展特殊性的忽略”“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消解”以及“对东方社会发展可能性的屏蔽”。新时代背景下，以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为思想武器，厘清并反驳欧洲中心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消极影响，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欧洲中心主义；理论偏颇；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

“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又称“西方中心主义”，该理论将西欧的历史进程视作世界不同民族、地区发展的样板，认为西欧社会、文化运行的规律应成为全世界发展的遵循，其内含“欧洲模式是人类发展的唯一模式，东方国家必须效仿”之主张。有学者指出：“（它）既是一种追求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错误的历史观，也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既是文化决定主义，也是文化相对主义；既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种族文化优越论。”^[1]可见该理论的理论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欧洲中心论”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一度甚嚣尘上：如英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指出：“欧美是拥有高度文化的世界，它们位于社会序列的一端，而蒙昧部落则在另一端，并按文化程度把其余的人群分配在这一范围之间。”^[2]更有甚者，部分学者将马克思划入到了“欧洲中心论”的阵营之中，如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指明：“马克思和韦伯就跻身于这些从较狭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新视野看问题的学者中间。按照他们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奉者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区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3]

毋庸置疑，无论是“欧洲中心主义”本身，还是将马克思视为“欧洲中心论者”的观点，都是对事实的曲解和屏蔽。因此以一种扎实的论据和论证方式澄清这两种片面理论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使命，然而国内学者却因“为尊者讳”“表述模糊”“论证不力”等原因将此问题

长期搁置^[4]，造成了当前“不上不下”的论证窘境，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原典出发，立足于“东西方比较”“全球化立场”之定位，驳斥欧洲中心论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曾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撰写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的通讯，向世界揭露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真相，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5]，以此类通讯文章为蓝本，将为论证“欧洲中心主义”的偏颇提供新的视角：

一、“欧洲中心论”对民族发展特殊性的忽略

“欧洲中心论”忽略了民族发展的特殊性，滑向了“历史可以机械复制”的理论误区。本质上讲，“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绝对化的理论主张，它认为欧洲的发展道路具有普遍意义，应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发展的模板，其言外之意是东方国家可以忽略自身地理因素、经济基础、历史文化、思想传统、政治状况方面的差异，仿照欧洲模式寻求“完美样本”，以此摆脱落后形态。事实上，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已经明言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可能性，历史阶段固然不可超越，但不同社会发展的路径又表现出多样性，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蕴藏在物质生活建设的内因和外因之中，并不存在一个普遍意义上的发展模板。以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为载体，两位经典作家固然是在“东西方大错位”的背景下洞见了中国，也指出了当时中西方存在的客观差距，但并不包含“中国应忽视自身条件，全力模仿西方”之意，相反，在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时，两位伟人还指明：“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6]783}“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会看

作者简介：赵继龙（1997—），男，汉族，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发展。

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7]就此而言，那些主张马克思是“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论断，是不符合文本依据的。本质上讲，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某个区域、某个民族至上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基点是全球视野——将每个具体的国家、民族纳入全球网络中，明确其定位，进而进行审视，才是其真正的研究立场。

二、“欧洲中心论”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消解

“欧洲中心论”消解了历史主体的选择性、能动性，将创造历史的“人”物化成了静态工具。标榜马克思是“欧洲中心论者”的学者以“殖民地”理论为工具展开论述，他们指证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的一段话：“英国在印度要完成的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革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6]857}据此，有关学者坚持认为马克思口中的“建设革命”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有力证明。笔者认为，此类观点至少产生了三项误判：其一，过分强调了事实判断而忽略了价值判断。在对待殖民地的问题上，马克思固然是看到了殖民宗主国的“双重作用”，但是“看到”并不意味着“赞扬、支持”，相关文章中并未见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发展模式的极力推崇和推销。欧洲中心论者断章取义，把“事实陈述”理所当然的视为“阵营划分”，实则是变“事实判断”为“价值判断”的典型陷阱；其二，美化了殖民地宗主国的初衷与目标。马克思指出的是“殖民主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在这里“不自觉”三字并非可有可无的修饰语，在一定意义上，它点明了殖民活动的性质：“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并不是为了帮助印度人民走进现代化，“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6]860}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英国的殖民活动是为了帮助东方构建文明，他们的核心任务始终是使资本增殖；其三，忽视了东方人民的历史选择性、能动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更替的过程是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历史选择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根本意愿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顺应程度。换言之，并不存在一个只依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国家，任何国家、民族的转型都需要自身提供原动力，“欧洲中心主义”一味强调外部影响，实则是将创造历史的本国人民物化成工具的看法。以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为载体，两位经典作家特别强调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只有中国人自己的斗争才能“保存中国民族”“开启整个亚洲的新纪元”。质言之，任何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掌握在本国人民的手中，唯有他们才是“自身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三、“欧洲中心论”对东方社会发展可能性的屏蔽

“欧洲中心论”人为地屏蔽了东方社会发展的可能

性，掉入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在其一生中的任何阶段都不仅仅以欧洲一隅为基点，其终极关怀始终是整个人类社会，因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变革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不会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6]862-863}事实上，“欧洲中心主义”本身就包含“二律背反”的窘境——如果此观点成立，那么何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中国革命将对世界革命产生重要影响”之命题。所以就中国而言，马克思固然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但他更强调的是“世界历史”的形成对于全球发展的影响：他们一方面指出了近代中国的沉疴弊病，但与此同时，更加尖锐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凶残、虚伪本性。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并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落后的一方，他们的论述更包含着对侵略者愤怒的声讨，从正义立场来审视，欧洲殖民者虚伪残暴，肆意践踏国际公约，马克思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将欧洲“文明”与西方标准奉为圭臬。另外，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看到了中国的反抗斗争对于本国的意义，还看到了这种反抗斗争对于殖民国家的意义：“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6]778}因此，所谓“欧洲中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绝不能以此论调来矮化马克思主义。

综上，我们要警惕欧洲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敢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不因部分言论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宽视野、高站位，以科学精神武装头脑，提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参考文献：

- [1]冯旺舟.政治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从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07): 69-76.
- [2][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8.
- [3][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刘北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16.
- [4]参见陈向义.为马克思“非欧洲中心论者”辩护的三重视角[J].浙江社会科学, 2014(05): 123-130+160+2.
- [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8: 12.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783.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9: 265.